



文艺节目要提炼“中国故事”

辽宁大学文学院 刘巍

选秀节目日渐成为话题,有的是因为节目本身的定位,有的是因为嘉宾的流量或人气,有的则是因为选秀的周边效应,比如偶像生成过程的曲折、主持人与嘉宾的过节、知情人爆料等。但万变不离其宗,选秀节目要站稳脚跟并获得持久效益,必须树立并实践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观,这就要求出演方、制作方、监管方三者的合力联动。

从偶像和粉丝的关系方面看,选秀节目不能消费或滥用粉丝的热爱,团队精心策划、形塑、构建出来的“人设”极易被某一句话、某一动作所摧毁。融媒体时代的来临带给观众太多的选择,沉浸式观看、短视频分段播放、弹幕吐槽等方式,使得粉丝、会员有热爱某些人的权利,但更有放弃某些人的自由。偶像和粉丝之间是相互选择、相互协商的互构关系,偶像某一行为造成的裂痕一旦出现则难以弥合。在维护品牌忠实度这一问题上,表演者和观看者作用相当。观众对节目的审美期待被一次次满足才能被留住,否则选出来的偶像只能拱手将收视率送给质量更为上乘的节目。因为选秀是选拔的过程,获奖选手的优胜之处要有说服力,获奖不是出资方决定的,不是剧本写出来的,不是导演导出来的,更不是演员演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不论节目倡导的是励志,是才艺,还是竞技,选秀的初心和使命都不能被更改,守正才能创新。

从制作方的角度看,提供一档好的节目,既要考虑投资方的商业利润,更要考虑节目的社会效益,二者共赢才能走向选秀的良性循环。虽说节目的观众年龄层次多元、受教育程度不一、审美需求各异,众口难调,但凭着博眼球、蹭热度获得的点击率和在看率仅可维持一时,选秀节目的口碑只能取决于品质。选秀节目的特点就是持续更新、全息呈现。我们看见嘉宾一步步从稚嫩向成熟、从朴拙到自信,舞台不过是节目的一部分,观众更能看到幕后的多视角呈现:嘉宾在海选的表现、排练的过程,与团队反复修改曲调、舞姿、配乐等的艰难磨合。优质的选秀,事前培

训、事中演出、事后剪辑、观众的反馈与节目组经验教训总结都是很关键的。目前,选秀节目同质化严重,抄袭、复制、拼贴导致节目的品质低下,说到底,不仅是选秀节目,所有的娱乐综艺比拼的都不是金钱、颜值和评委,而是策划,即被策划出的选拔赛制,和对偶像生成目的的实现。选秀要有特色,要秀出别的节目没有的亮点,就要求制作方秉承节目的宗旨,“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地操练,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在节目定位、演员队伍、传播策略上形成独特个性,提升品牌的辨识度。

从监管层面看,秩序是养成的,是观众和嘉宾、评委和导演在实践中对规则、标准的遵守。监管制度是选秀节目的保障,制度、规则的设定要兼顾特殊性与系统性,特殊性是使规则能在各自的板块中被执行,系统性是使其受控于文化、道德、政策、法律。选秀节目是由多个层面构成的系统,每个层面都隐含了某些标准。所以,标准的执行既要符合各层级的利益,也要在大的系统中明确自身的定位,保持价值观的纯净。虽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但在演员嘉宾的素质层面,自我约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其言行,而来自外力的约束、监管才更为有效。监管方要把工作落细落小落实,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将有悖于道德伦常、有悖于真善美,甚至有悖于法律制度的某些可然性因素消灭。监管方不能总是采取灭火式扑救,运动式执法的方式,要让监管成为常态,定期、定时、定量、定性地对选秀节目乃至所有的综艺节目进行审查,而非事后惩戒。

选秀节目的热度不减说明它有极丰厚的矿藏,怎样对其有效地开发与提炼?笔者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工业科技、语言传播等中国故事皆可转化为选秀的动能。娱乐功能与社会效益、艺术审美与商业利润是天平的两端,只有演出方、制作方、监管方用心、用力,在品位和格局上“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选秀节目的未来才有希望。

■关注

由“倒牛奶”视频引发的对综艺选秀节目的争议和批评,进一步催生了对“流量为王”的粉丝经济的深刻反思。我们需要警惕非理性的价值观和不良风气的滋生,会对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成长带来恶劣影响。因此,文艺节目的生产传播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始终在娱乐功能与社会效益之间、艺术审美与商业利润之间保持平衡。

实现理想不能依靠“走捷径”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罗小茗

“没有白日梦,任何人都无法生活。”

在《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为白日梦如此正名,是它让人摆脱庸常无聊的生活,暂时寄居。一个社会中需要大小小、成色各异的白日梦,供人享用。就此而言,无论是粉丝经济的大规模形成,造星运动的蓬勃兴盛,还是游戏世界的令人沉溺,各种限制、禁令乃至舆论监督之所以无法将其完全扼杀,正源于它们承担了为那些急于找寻意义的人们生产某一类白日梦的功能。这也意味着,一个社会对于白日梦的想象越是稀薄,辨认越是马虎,可供选择的类型越是单调稀少,由资本所主导装配、批量生产某一种白日梦的流水线就越是有了年终无休、碾压一切的蛮力。

今年5月以来,由“倒牛奶”视频引发的对于打榜选秀节目的争议封杀,便是一例。既有的讨论大多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批评粉丝的非理性,指责资方对这些行为刻意设计。也有人冷静地指出,造星打榜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恰是各方经济理性博弈的必然结果。却很少有人将矛头指向这种特定类型的白日梦,辨认它的特性,从当前的白日梦生成机制以及可能类型上寻找“失范”的根源。这或许是因为,经济业已成为评价一切的隐形前提。在重视经济的社会氛围中,一旦此种类型的白日梦——所谓的“粉丝经济”在经济上赢得了荣誉,便很难对其展开彻底的追究。

然而,白日梦从不坐落于经济之上。它的狡黠诱人之处,正在于帮助人挣脱既有的陈规旧律,搁置“只能如此”的经济理性,罔顾赤裸竞争的现实逻辑,在此之外创造暂时寄居的天地,获得片刻的自由感。吊诡的是,在选秀打榜这一类型的白日梦中,人们用来填充梦境、让梦做得更久一些的手段,却正是希望用白日梦来抵御或逃离的竞争逻辑。无论是粉丝买票打榜,为自家明星赢得出场率,还是利用网络手段作弊,彼此抹黑,都笼罩在既无审美、也无趣味的经济理性之下。一旦“票数越高,出镜机会越多”的逻辑被毫无保留地制定与接受,花样百出的“走捷径”也就成了粉丝们理直气壮争取权利的唯一手段。凡此种种,既说明这一整套造梦机制受制于赤裸

的竞争逻辑,不提供片刻的自由,也说明这种类型的白日梦,不仅成功霸占了人们逃离现实的欲望,更由人对“走捷径”的依赖具有了逼迫其在梦中更高强度地体验现实的蛮力。

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从经济或从社会规范出发都很难解释清楚的问题:如何理解人们在白日梦中也必须“走捷径”这件怪事?或者说,人们是否充分意识到它的吊诡之处并正视之? 选秀打榜也好,游戏氪金也罢,这些白日梦貌似不同,实则如出一辙:霸占逃离现实的欲望,鼓励人们在其中“走捷径”。按理说,当一个社会中,人人因别人“走捷径”的不择手段的竞争无法实现公正、被迫活得很累的时候,白日梦也就自然被植入了对正义的期待。然而,在当前这套白日梦的生成机制中,可供选择的却只有让各种“走捷径”的手段充分常态化的这一种类型。这一点既构成了粉丝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也孕育了社会由此失范的条件。就此而言,“倒牛奶”不过是肉眼可见的浪费。在此背后流淌殆尽的,是难以捕捉,更无法量化的一代或几代年轻人的时间精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判断能力、做白日梦的能力,以及一个社会所必需的正义感和羞耻心。换言之,倘若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白日梦只有这样一种“走捷径”类型,不仅巨大的社会浪费无法避免,人们做梦的权利被严重剥夺,就连社会也不得不陷入现实与梦境彻底重合的困境之中。

因此,问题并不仅在于批评肉眼可见的“失范”,更在于经过此类事件后,人们是否真正认识到白日梦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从不在乎经济,而是在于帮助人们从梦境中获得真正与现实拉开距离、对其加以审视的清醒和勇气。当一种白日梦无法丰富人们的生活,提供不同的运行逻辑,反而让人变得怯懦投机之时,应该果断地将其摒弃。当生成白日梦的机制只提供这样一种白日梦,彻底剥夺人们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可能的时候,应该径直反思这套机制,对其展开改造。这是因为,无论是谁,个人也好,团体也罢,只要仍存活在现实之境,就有责任为自己,也为他人保留一个做更好的白日梦的机会。

■建党百年·讲座

陶友兰：红色翻译在域外的传播

（特约记者 谢佳琪）5月26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陶友兰应邀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卓越讲坛·全球传播系列讲座”上,作了题为“红色翻译在域外的传播”的报告。

在讲座中,陶友兰教授回顾了“红色翻译”的百年历史。红色翻译发轫于“五四”时期,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等国际著作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抗战时期,艾思奇、何麟等翻译家开始有计划地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抗战胜利提供理论支撑。抗美援朝时期,郭沫若、毛岸英等对内传播科学思想,对外宣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还利用翻译广泛进行战争宣传、情报搜集、友军合作和对敌谈判等工作,加强与世界人民的联系,促进世界和平。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外文局为主的对外传播机构陆续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翻译出版,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交织着红色翻译史,历史见证了红色翻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催化剂。”

我国红色翻译传播效果最突出的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文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首发式以来,陆续被译为英、法、俄、阿、西等20多个语种,发行超过660多万册;2018年4月18日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海内外同步推出28个语种、30个版本,发行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已累计发行1300多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文献,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广为传播。

陶友兰教授认为,在传播层面上,我们应努力推动红色传播的多层次化、多模态化和民间化。在传播过程中要与时俱进,更新传播形式,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加强对外联系,才能达到使受众及时、主动传播新思想的目的,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当下,中国红色翻译的语种逐渐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的红色翻译体系日益完善。陶教授特别指出,我们在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要不忘初心,尊重差异,追求和谐,既让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资讯 更多内容请登录《社会科学报》网站 www.shekebao.com.cn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5月28日,同济大学举办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首届“同济天下法治论坛”。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会长崔亚东和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分别致辞。

沈德咏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社会的坚强政治保障,要全面贯彻《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与时俱进完善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强化公民权利保护意识,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加强权利本位的理论研究和普法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法治社会建设良好氛围。崔亚东在致辞中指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法学界的责任和使命。方守恩表示,举办此次法治论坛对于同济大学推动培养德法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加快法学学科建设、提高学校依法治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论坛上,清华大学王晨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季卫东教授、复旦大学孙笑侠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张志铭教授围绕主题作了报告。

华东政法大學聚焦雷经天法治思想

5月22日,“雷经天法治精神传承系列活动之人民司法理论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學举行。

会上,天津财经大学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侯欣一教授对雷经天思想的内涵在人民司法制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深刻阐释。他指出,研究人民司法制度在该时期的发展,不可绕开对雷经天的研究,他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司法理论与当前的人民司法理论有密切关联。

华东政法大學法律文明史研究院何勤华教授和廖晓颖以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为典型案例,提出了我国人民司法思想的六个主要特征: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对政法工作有统一的领导权;二是依法办事,人民法院认真执行国家法律制度是正确地审判案件最重要的保证之一;三是公正和效率,一方面法院应该简化自己的办事手续,另一方面应提高办案人的能力;四是司法因强制而权威;五是树立司法公信力,判决不仅使当事人信服,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六是审判独立,法院审判只服从法律。

第三届浙江大学雄安发展论坛举行

5月29日,第三届浙江大学雄安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着重探讨了如何解决雄安新区

区基础薄弱、产业发展短板、公共服务先行等问题。将北京可疏解的非首都功能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进行对照来看,只有部分行政机构和教育医疗机构等第三产业可作为疏解项目。因此,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北京的疏解,应自谋出路,“平地起高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指出,要实现雄安新区高质量的建设发展,需要全面提高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能力,把北京疏解项目有机转化为雄安发展优势,要正确疏解,避免不当疏解;应精准聚焦创新经济中的重点定位,着重优化新区经济、教育、医疗等城市功能;全力探索先进特色制度文化这一持久命题,在构建全球网络枢纽的基础上,塑造生态智能城市并管建先进制度文化;等等。

共述上海建党往事,同上“四史”思政大课

5月26日,上海师范大学“同上‘四史’思政大课”第一课——“同上中国共产党历史思政大课”开课。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通过对“建党为什么是上海:聚焦城市化、工业化、租界、文化、共产国际关注的城市史研究视角”“人物、空间与建党活动:将老渔阳里、新渔阳里、一大会址等空间贯通思考党的创建史”“保护上海红色史迹:上海众多革命遗址、红色遗迹、纪念地和重要领导人的故居、居住地等承载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保护任务更加紧迫”等一系列主题的深刻阐述,系统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的故事。上海师范大学张正光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青年立足新起点、新征程,深刻汲取历史经验,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时代使命。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月30日,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政策创新研讨会在南京举行。研讨会由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整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办。

与会专家围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金融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制度创新、资源环境与政策等议题展开了交流研讨。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冯淑怡指出,深化资源环境政策创新,可以有效推动各地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保护,在高水平保护中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成立以来,始终自觉服务国家战略和江苏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将继续深入开展决策咨询,打造资源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形成资源环境治理的“中国理论”。（本栏目内容由宋纪祥整理）

■学术看台

数字金融促进家庭金融福利

李晓、吴雨、李洁在《统计研究》2021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商业保险服务可得性促进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社会互动水平促进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年轻、教育水平较高、金融知识较高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群体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更大。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福利具有促进效应,但是也要考虑如何促进社会弱势群体对数字金融的使用,以收到更大的普惠金融效果。

靶向优化还是自主进化

蔡之兵在《人文杂志》2021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变的必经之路。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了我国治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引发了诸多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的信息系统化不仅解构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同时该系统模型的稳定性检验和最优国家治理体系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矛盾,也证明最优国家治理体系并不存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只能是自主进化而非靶向优化。文章进而指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追赶体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追赶体制转向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的协调体制。

新发展理念的原创性贡献

韩喜平、丛立峰在《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新发展理念充分把握人类发展理念的演进规律,在全面总结我国各阶段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而形成一整套内部要素相辅相成的理论体系,展现出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继承性、创新性、实践性和战略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在经济发展内涵、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整体性分析破解发展难题、坚持人民立场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实践唯物主义的三重辨护

卜祥记、刘雅兰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近40年来,国内学界针对实践唯物主义所展开的原则性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实践唯物主义放弃了唯物主義基本立场、再度把实践原则神秘化以及并未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不论是作为新哲学范式的实践唯物主义,还是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具象化展开的唯物史观,它们都只是马克思用于破解资本主义之谜的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工具,而不是马克思全部理论工作的宗旨所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要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精神,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反思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汉德克作品的新主体性内涵

胡铁生在《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2019年汉德克“以语言才华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挖掘了人类体验的边缘性和独特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中,彼得·汉德克在语言哲学转向的影响下以语言游戏为主要叙事策略进入文学创作领域,但不久就转向以描写个人的主观知觉经验,突显个人感情为基本特征的新主体性文学创作。在新主体性文学流派中,汉德克成为“继承传统的反传统”作家,其作品以自省的方式,将人的生存空间缺失和寻找自我作为其创作的主题,核心议题是主体与世界的冲突。身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新主体性文学的双重语境下,汉德克主动将自身置于边缘的位置,以其语言才华将人类体验由边缘性向独特性演进,体现出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并为回归文学传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此外,在坚持文学性、反对文学作品参与政治的前提下,汉德克不仅在其作品中,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为维护人的尊严与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苏轼的人文史观

杨庆存、郑倩茹在《东岳论丛》2021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从中华民族发展史高度审视儒学作用与影响,以丰富史实系统阐释“孔孟韩欧一脉相承的儒学谱系,认为儒学的创建与传承“功与天地并”,集中反映了苏轼的人文史观。苏轼人文史观既以深厚儒学修养为基础,又得益于欧阳修的熏陶与时代思潮濡养,不仅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特征,成为文化社会实践的内在动力,而且引领了时代的文化发展,并给后世以深刻的思想启迪。